

沈阳师范大学经济研究论丛

The Economic Research Series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ew System Economics Study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

Economics

张雪艳 李楠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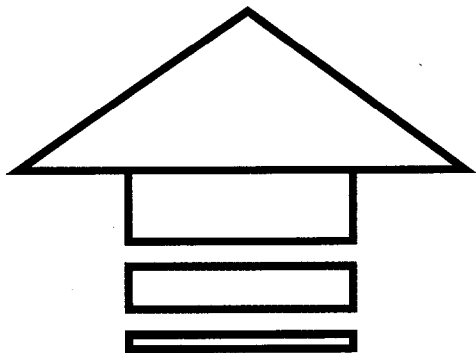
白山出版社

New system Economics study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

张雪艳 李楠 · 著

Economics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张雪艳, 李楠著. —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06.5

(沈阳师范大学经济研究论丛)

ISBN 7-80687-081-4

I. 新... II. ①张... ②李... III.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 IV. F0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8822 号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 编	110013
电 话	024-23088689 82077898

责任编辑	孙玲丽
封面设计	王姣人
版式设计	罗 璇
责任校对	赵 中

印 刷	沈阳新腾扬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8.125
字 数	20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书 号	ISBN 7-80687-081-4/F·21
定 价	225.00 元 (全九册)

序言

Prologue

2004年末，沈阳师范大学将“西方经济学”确立为校院共建学科，投入一定经费予以扶持。我是这个学科的负责人。与以往常规的做法不同，我和我的学科成员们决定用这笔资金来做以下三件事：

首先，我们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四门基础课程标准化，作为我们这个学科的品牌课程加以推出。所谓标准化，就是不仅要有科学合理、基本固定的教学内容、教学大纲和教学参考书，还要有稳定的讲授教师和高水平的授课。其次，我们决定在学生中积极倡导和推广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论文写作方式。为此，我们决定编辑如何做研究以及如何撰写科学论文的手册，指导学生如何欣赏经济学研究论文，如何组织和从事经济学研究。最后，我们决定以一种我们喜爱的方式集中展示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就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我们将它取名为《沈阳师范大学经济研究论丛》。

坦率地讲，经济学在沈阳师范大学还是一个年轻的学科。我们甚至在想，取这样一个名目是否恰当。但的确没有更好的名目了，权当是我们对于自己的一种鼓励和鞭策吧。

这套丛书，有的是作者近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的集结，有的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有的是作者就某个问题的专题研究。我认为，这些工作不乏思想和创新，又基本遵循了学术著作的写作规范，更有不少工作修正和发展了流行的经济学知识，是值得拿出来集中展示一下的。例如，丛书中对于“效率”、“囚犯难题”、“马歇尔的‘剪刀’”、“菲利普斯曲线”等经济学基础内容的新的解读和阐释，都是修正和发展了流行的经济学知识的。我想，将来（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经济学教科书多少是要有所改观的吧。

我无法一一列举这些工作，而且也不可能把它们讲得更清楚。还是留待读者朋友们自己去阅读这些著作本身。这里我要对我们的学科的性质和我们的工作的性质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在中国，就社会科学来说，一个学科的命名和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意识形态的性质以及政府部门所能理解与认识的程度。“西方经济学”这个显得越来越尴尬的学科名字，就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但我们并不介意这些学科叫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看到的只是一种含义上的经济学。我们认为，我们都在从事现代经济学范畴里的工作。而且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从事这样的工作，努力去塑造沈阳师范大学经济学人的研究风格和研究能力。

最后，我要感谢沈阳师范大学，这里不只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它提供的相当宽松和自由的学术空间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持久的影响。当然，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事们，没有他们的热心、理解、投入和对学术的执著追求，我的很多想法是难以落实的。

谢作诗

2006-3-31

前言

Preface

新制度经济学是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人在批判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等其他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基础上以制度分析为对象建立的学科。新制度经济学现在已成为解释和分析经济现象、解决人们所面对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有力工具。20世纪8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被介绍到中国，并迅速传播开来，它的理论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运用这一理论方法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在传播、运用的同时也出现了生搬硬套现象及浮躁情绪。所以必须认真探讨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新兴的尚待成熟的学科，使它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书中首先概述了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发展状况，并探析了它与新古典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马克思理论的理论渊源关系，然后对它的制度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理论等主要理论进行了研究性概括，且对每一理论都做了深刻的评价和分析，加深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 and 研究，使之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的指导性经济理论。

目 录

Contents

001 ▶	第一章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
001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背景	➡	
005 ▶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
013 ▶	第三节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传播	➡	
022 ▶	第二章 新制度经济学的流派渊源关系		➡
022 ▶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	➡	
029 ▶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的关系		➡
036 ▶	第三节 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	➡	
045 ▶	第三章 制度理论		➡
045 ▶	第一节 制度的一般理论	➡	
053 ▶	第二节 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		➡
071 ▶	第三节 理论评析	➡	
074 ▶	第四章 产权理论		➡
074 ▶	第一节 产权的内涵	➡	
077 ▶	第二节 产权的功能		➡
079 ▶	第三节 科斯定理	➡	
087 ▶	第四节 理论评析		➡
092 ▶	第五章 交易费用理论	➡	

092 ▶	第一节	交易费用的提出	➡
094 ▶	第二节	交易费用的涵义	➡
099 ▶	第三节	交易费用的性质和原因	➡
105 ▶	第四节	理论评析	➡
109 ▶	第六章	企业理论	➡
109 ▶	第一节	企业的产生和边界	➡
116 ▶	第二节	企业的契约性质	➡
119 ▶	第三节	团队生产理论	➡
121 ▶	第四节	委托——代理问题	➡
123 ▶	第五节	理论评析	➡
131 ▶	第七章	经济增长理论	➡
131 ▶	第一节	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批评	➡
135 ▶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增长理论概述	➡
139 ▶	第三节	诺思的经济增长理论	➡
151 ▶	第四节	理论评析	➡
156 ▶	第八章	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	➡
156 ▶	第一节	国家理论	➡
163 ▶	第二节	意识形态理论	➡
175 ▶	第三节	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制度	➡
179 ▶	第四节	理论评析	➡

第一章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新制度经济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孕育和产生。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新制度经济学热潮，其波及之广，影响之大，堪与美国 20 世纪头 30 年发生的“制度主义运动”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中国制度变迁的背景，使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学术期刊上大量充斥着介绍、比较、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章，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译著、专著层出不穷。制度思想向社会生活中渗透，媒体中经常出现新制度经济学的词汇、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对某些地区和部门的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某些改革措施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背景

新制度经济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这一段时间孕育和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

一、时代背景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企业合并浪潮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是新制度经济学产生的直接诱因。如前所述，科斯 1937 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是标志着新制度经济学产生的最早的代表作，而科斯这篇论文的形成是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西方国家的企业合并浪潮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我们知道，发生在西方国家的第一

次企业合并浪潮是在 19 世纪到 20 世纪转折时期的 1895 年至 1904 年。这次企业合并浪潮以横向合并为特征。而第二次合并浪潮出现在 1916 年到 1929 年期间。这次合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纵向合并和混合合并的数量大大增加。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谈到了他为什么要研究企业的性质这个问题。他是从对这样两个问题的思考开始的：既然传统经济学讲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好机制，为什么还会出现企业和企业合并？他的结论是：企业和企业合并可以节约交易费用。企业合并可以节约交易费用，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市场交易呢？为什么不在一个大企业内进行所有的生产活动呢？如同列宁所说：整个苏维埃是一个大工厂。科斯的结论是：企业规模扩大会增加管理费用（另一种交易费用），所以，企业的规模决定于它代替市场节约的交易费用与由此引起的管理费用在边际上相等。

随着 20 世纪以来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外部性”问题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突出，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产生的又一重要诱因。早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外部性”问题就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出现而出现，但“外部性”问题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突出则是随着 20 世纪以来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而出现的。早在 1912 年，庇古就在其《财富和福利》一书（1920 年扩展为《福利经济学》）中对“外部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形成标志的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也正是针对资本主义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外部性”问题。例如，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谈到的“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库克诉福布斯”案和“巴斯诉格雷戈里”案等，都是资本主义现实中普遍存在的空气污染、噪声干扰等“外部性”问题的典型案例。正是因为现实中存在着大量“外部性”问题，才诱使科斯等经济学家进行研究，从而，才有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践所导致后果的反思和经济改革的尝试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绩效差异，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这反过来促进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国家，由于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影响，激增的政府干预和日益政治化的经济生活导致了許多无法预料的后果。在这些后果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传统经济秩序面临新的挑战。这导致了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助长了对公共政策的不满以及一些顽强的经济改革尝试（例如私有化和解除管制）。这使人们认识到，日益精简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对经济后果是至关重要的。新兴工业国家和不发达经济国家的人们也已意识到，制度需要培养。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没有涉及经济发展问

题中重要的、真正具有本质的方面，特别是没有涉及实现自由、经济繁荣和安全的制度发展。而当人们在分析东亚国家与非洲经济的增长经历何以如此大相径庭时，制度的关键作用是无疑的。

近十几年来，国际竞争有了很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不同制度系统之间的竞争。在吸引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本和企业方面，有些国家的制度系统已经证明是成功的，而那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开始努力仿效成功国家的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在近些年兴起与大量经济转型国家的存在及其这些国家对制度经济学的需要也存在密切关系。转型国家的人口几乎占世界的 1/3。经济转型主要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型的实质是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现在，转变前社会主义的挑战已经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才智，使之聚焦于各种制度在利用知识和交易上的重要性。同样，那些顽固坚持收入再分配和公共福利供给从而存在大量政府管制的经济的西欧的人们，也正体验着创新减缓、增长放慢和新就业机会减少带来的现实生活。那里的许多观察家目前也在呼吁制度改革。要想理解他们的论据，首先需要将制度明确地纳入经济学理论。如果将明晰的制度分析置于研究之外，就完全无法满意地解释，为什么将许多像福利供给那样的政府经济活动（重新）私有化在总体上是有益的，以及为什么解除管制会有好处。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分析，有利于帮助人们掌握转型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利于决策者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更科学，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二、理论背景

新制度经济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形成和兴起，其深刻的理论背景是：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的忽视。这一忽视使其模型日趋僵化，如果不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很难用于各类重要的问题的分析。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僵化引起了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不满和批判，并由此导致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

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新古典经济学泛指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初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以边际分析方法和原则为特征的各种学说，除马歇尔经济学以外，还包括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杰文斯经济学、以魏克赛尔为代表的早期瑞典学派以及美国克拉克的经济学说等。在此广义上，新古典经济学

实际涵盖了从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经济学之间西方主流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构成后来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一切命题和基本分析方法，都包括在最初由瓦尔拉斯提出的、至今发展为“阿罗—德布鲁模型”的市场一般均衡体系当中。

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就是在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忽视的基础上才形成的。科斯指出：主流经济理论经常把企业描绘成一个“黑箱”。这是非常离奇的事情，因为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大部分资源是在企业内部使用的，这些资源怎样使用依赖于行政性的决策，而不是直接依赖于市场的运作。结果，经济体系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织，当然特别是现代公司，是如何处理它们的事务。甚至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经济学家的兴趣在于价格制度。他们却忽略了市场这种支配着交换过程的更具体的制度安排。由于这些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产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拥有的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理论，这就是说，在新古典经济学里，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不是组织内部的制度安排，而是市场发生了什么，以及生产要素的配置和这些生产要素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销售，一句话，他们感兴趣的是市场体系的价格理论，而对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和交易活动所依赖的制度结构根本不感兴趣。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忽视显然是科斯写作《企业的性质》一文的重要原因，这导致了科斯交易费用这一重要理论的形成，并由此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

舒尔茨 1968 年也对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的忽视进行了批评。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在陈述经济模型时的一个积习难改的特征是，他们并不提及制度。但尽管有这一疏忽，现代经济学仍在着力为制度变迁寻找理论支持。不过一个无法掩饰的事实是，他们在考虑制度问题时，分析的橱子里是空荡荡的，里面只有几个被视为无用了的标有制度经济学的旧盒子。他还说：现有的大量（新古典）增长模型就是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因而制度被剔除掉了。在他们看来，这些制度不会发生变迁，它们或者是外生的，或者是一个适应于增长动态的变量。诺思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制度变迁理论也是建立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对制度的忽视的批评的基础上的。正如他所说：新古典增长理论暗含的假设前提是世界是和谐的，制度并不存在所有的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简言之，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在新古典模型中，除了市场外并不存在任何组织和制度。

林毅夫提出了著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理论，在提出这一理论前，他也对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的忽视提出了批评。他说：对制度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之一。与此相反，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把现代西方经济的制度视为当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备的信息和无摩擦交易一般均被当作暗含的假设。再加上对生产和效用函数特征即所谓奉古典环境所作的假设，福利经济学上两个有名的最优定理在市场经济中似乎就有可能实现了；首先，如果存在完全竞争，资源配置就会是帕累托最优；其次，任何在技术上可行的特定的帕累托最优都可以通过建立自由市场和适当的要素所有制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被缩减为生产函数的同义词，除市场之外的制度安排没有考虑的必要（因为市场能更有效地执行资源配置功能），而政府的干预也只有在“古典”环境受侵犯而导致市场失灵时才被允许施行。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由现实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柯武刚和史漫飞作了如下界定：它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以及这些规则和规则集的实施对经济后果的影响。制度经济学还与制度如何在经济环境的变迁中演化有关。简言之，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诺思的定义则是：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新制度经济学家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把制度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革命，制度至关重要，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有了制度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制度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有关分析应该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

经济学总是离不开一些基本的假设前提，特别是对人类行为的假设。只不过有些假设是明显的或公开的，有些是隐含在其中的。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这表明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要更接近现实。我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基本假设主要

要有三个方面

1.利己与利他的双重性。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把人类行为界定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利己主义的化身，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人”。人的一切行为都表现为趋利避害，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亚当·斯密说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在一定条件下，“经济人”假设有利于经济学家们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假设或前提越简单，就越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但在许多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假设更为复杂，利他主义动机也常常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正如诺思所说：我相信传统的行为假定已妨碍了经济学家去把握某些非常基本的问题，对这些假定的修正实质上是社会科学的进步。行动者的动机比现有理性假定的要复杂得多。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做出选择的结果。诺思的意思是，人类行为中不仅有利己主义的一面，也有利他主义的一面，如：义务献血而不留名，为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单纯地做出牺牲等等。

诺思把诸如利他主义和自我施加的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了更加复杂的、更接近于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的过程。纳尔逊和西尔伯格进一步证明了个人为表达他们自己价值和偏好所付出的代价越低，这种非财富价值在他们所作的决策中就显得越重要；反之非财富价值则只能解释人类很少的一部分行为。这表明，实现非财富价值不能总是以牺牲个人财富为代价。制度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能够改变人们为其偏好所付出的代价，改变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的权衡，进而使理想、意识形态等非财富价值在个人选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就揭示了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内在联系，即如果制度产生于人类行为中追求财富价值所具有的集体行为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就会通过制度改变人们为追求非财富价值所付出的代价表现出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

但制度在塑造人类这种双重动机方面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人的有限理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把人假设为单一的“经济人”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器，而且，假定“经济人”具备完全理性，即假定人随时随地都自觉地、而且全智全能追求“最大化”，或“最优化”，是具备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正如马丁·霍利斯等所说：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阐释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的潜在假定存在于投入和产出、刺激和反映之间。我们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我们知道，无论他要什么，他会不顾一切地以最大化的方式得到它。显然，“经济人”要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必须具有完全理性。阿罗最早认识到人的理性的有限性，用他的话说，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西蒙认为，完全理性不符合人类行为的现实。他从人的意识、决策环境与人的能力、决策目标等方面全面否定了完全理性假设，论证了有限理性论。科斯也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说提出了批评。他说：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作这样的假设，即人是理性地追求最大化的。在我看来，这个假设既没有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诺思直截了当地指出：毫无疑问，人们处理信息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他认为，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经济活动交易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威廉姆森把理性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强理性，即预期收益最大化；二是弱理性，即有组织的理性；三是中等理性，介于以上二者之间。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是收益最大化，即第一层次的。而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的是中等理性，即有限理性。威廉姆森认为，有限理性就是关于领悟能力的一个假定，有了这一条，交易成本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才能成立。在有限理性中，各种经济角色的心态就被视为理性有限却刻意为之。交易成本经济学承认理性是有限的，并认为应该重视“有限和刻意”这两种含义。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如果承认人的领悟能力有限，就会促使人们转而研究制度问题。只有承认理性是有限的，才会更深入地研究市场和非市场这两种组织形式。在威廉姆森看来，理性有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就需要正视为此所付出的各种成本，包括计划成本、适应成本以及对交易实施监督所付出的成本。如果我们把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这些因素考虑进来，那么可以说理论家们对人类行为的系统性认识还很不全面。阿尔钦提出，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性行为也许需要通过研究行为方式的办法来分析，而不能仅依据传统经

济学中寻求最优化的边际调整方法。不完善的预见能力阻碍了个人行为，即使我们可以界定什么是最优时，一个人或许仍不能解决“包括了一系列变量的复杂问题”。理性的人面对不确定性的反应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严格地遵循那些在过去与成功有关的习惯做法和常规做法；二是采用试错的方法。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契约的选择及制度安排对于个人实现最大化利润就至关重要了。在此，我们还有必要讨论一下“有限理性”与“不完全信息”的关系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有限性”可以归结为“不完全信息”这类问题，即只要愿意付出足够高的信息成本，理性就可以是无限的。西蒙说：我只是部分同意这种结论，但有两点保留：第一，谈论什么“如果我们信息灵通的话，我们就会怎么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根本上就不会有这种情形。第二，由于人脑有限，我们只使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的一小部分去帮助我们思考。太多的信息与太少的信息同样是不理想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信息，而在于我们能够“加工”多少信息？我们的知识能使我们分析什么样的信息，并从中抽取有意义的部分，因此，人类要求获取信息之原动力乃是人类灵魂深处希望更好地与他们的世界打交道的企求。这里存在一个信息悖论。信息搜寻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因为在获得信息之前无法确定信息的价值。通常不可能事先就知道，要等信息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经验才会告诉人们，已可以进行决策。信息成本一旦发生，那就是沉淀成本。信息的价值不可能在获得它之前得到评估。

这一事实构成了一个确凿的陷阱，它使信息搜寻成为一项有风险的活动，从而大大地限制了人们对信息的搜寻。

在现实世界，信息不仅具有不完全的特征，而且还具有不对称的特征。所谓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对交易品所拥有的信息数量不对等，例如在汽车交易中，卖方可能要比买方对汽车有价值的特征知道得更多。信息不对称分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和事后的信息不对称。事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交易一方关于一项潜在的购买（销售）所具有的信息，少于另一方所具有的，但在交易完成后，此种信息的不利因素即不复存在。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则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在交易完成后，交易一方所具有的信息少于另一方的情况依然存在。无论是事前的信息不对称，还是事后的信息不对称都会导致一系列经济问题。有人甚至认为，经济学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中找到本源。

3.既有机会主义一面又有诚信的一面。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人的机

会主义行为倾向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它被视为经济主体的一个重要的行为特征。所谓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指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用经济学术语来定义，所谓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是指在非均衡市场上，人们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威廉姆森说：机会主义是指信息的不完整的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指旨在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它是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实际条件或人为条件的原因，这种情况使得经济组织的问题大为复杂化了。在威廉姆森看来，人们追求私利有程度深浅之分。程度最强烈的，也是交易成本经济学所注重的。威廉姆森假设，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尽最大能力地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自私且不惜损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损人利己，这就是机会主义。与亚当·斯密不同，亚当·斯密只看到人的利己心，市场机制可以巧妙地利用人们的利己心，把人们增加自己利益的行动引导到增加社会福利的方向上来。在损人利己的情况下，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得到限制。由此威廉姆森认为，人的机会主义本性增加了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影响了市场的效率。机会主义的存在是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

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追求私利的人与新古典经济学所讲的追求私利的人的区别主要有，后者是分析交易双方在一种确定的环境下、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确实能增进社会福利。这样一来，经济组织的问题也就变成了各种技术特点。而新制度经济学所分析的是交易双方在一种不确定的环境下、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行为和结果要复杂得多，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就特别强调制度、法律、产权及治理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

当然，威廉姆森有关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假说也受到了不少批评。努德海文就认为，威廉姆森只强调了人类行为动机中机会主义倾向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或者说忽略了人类行为中还有信任的一面。正如努德海文所说：“交易成本经济学在分析经济组织时，假定机会主义是人性中恒定的内核，而可信度只是对它的补充，且后者随着各国文化和制度的差异有所不同。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信任只起到了微不足道的作用。只有在交易的另一方无需做出机会主义行为就能满足自身最大利益时，信任行为才不会与个人行为假定相冲突。